

# 預示農村好生活： 一個青年移居埔里的生活方式政治

蔡嘉信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本文探討一個以埔里農村為移居目的地的青年團體在什麼脈絡與條件下，選擇以生活方式為手段來體現農村好生活目的，以及這種預示實踐如何被維持？作者經由生活方式政治視角看到自由空間對於此預示實踐的形成扮演關鍵角色，此自由空間源自農村在發展過程中留下的空隙，青年團體住進這些空間，為農村創造好生活的可能性；而在這個預試實踐的維持過程中，放伴實驗提供了動力。此放伴實驗沒有為青年團體開創有規模的創新創業模式，但是形成以放伴為核心理念的社群。此放伴社群中的互惠交換原則、戲劇空間和逐漸開展的居住空間等要素，是在試誤的過程中創造出來，本文討論的青年團體也因為這些自立條件得以持續留在農村。

關鍵詞：生活方式政治、預示政治、自由空間、移居農村、放伴

---

台灣社會學第 48 期（2024 年 12 月），頁 43-86

收稿：2023 年 11 月 30 日；接受：2024 年 12 月 9 日

\* 通訊地址：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mail: jst@gate.sinica.edu.tw

## Prefiguring the Rural Good Life: Lifestyle Politics for Rural Relocation in Puli

Jia-Shin Tsa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style politic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text and conditions in which a youth group, the Guli Cooperative, uses lifestyle as a mean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the “Rural Good Life” in rural Puli, and discusses how such lifestyle politics are sustained.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se lifestyle politics are implemented in a prefigurative way, and “free spac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is prefigurative practice. This free space is a form of interstice left in rural areas amidst a broader context of economic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youth group chooses to reside in the empty spaces to create possibilities for a good life. In terms of maintaining prefigurative politics, the *pàng-phuānn* experiment produces a reciprocal principle of exchange without currency, a theatrical space, and expanding living spaces for immigrant youth in a trial-and-error process. This *pàng-phuānn* community gradually strengthens the youth immigrants’ subsistence in rural Puli.

*Keywords: lifestyle politics, prefigurative politics, free space, rural relocation, pàng-phuānn*

## 一、前言

作為一個移居的目的地，埔里是一個非都市地區，或說鄉村地方，<sup>1</sup>自 1960 年代末期以來開始有藝文工作者從求學地返鄉教書或開業。1980 年代起，選擇埔里作為藝文工作基地的移居者更多了，有返鄉的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一直到 1990 年代，埔里仍是藝文工作者選擇移居的理想目的地（鄭瑜雯 1988；楊智富 1990；楊智富等 1990）。<sup>2</sup>不過埔里的「農村」意象在這些藝文工作者的移居脈絡下沒有被凸顯。

進入 2010 年代，不少青年移居埔里，從事文創、農業生產、農業行銷等工作。這時候，全台已有普遍的「青年返鄉」風氣，高學歷青年返鄉就業的故事不時躍上媒體版面，也帶動不少有志於回流鄉村的青年跟進。<sup>3</sup>在這波青年返鄉潮中，埔里是移居的目的地之一，農村意象較過去鮮明。本文在這個脈絡討論一個在青年返鄉意象下可能被隱沒的特殊案例——穀笠合作社。

穀笠合作社是以埔里農村為移居目的地的青年團體。像這樣的青年團體，大多被冠上「返鄉青年」、「青農」或農村中的「文青」，但這些稱號對他們而言都不貼切。從他們與居住所在地的關係來看，非埔里當地出生的他們自認是埔里的移居者；從他們的行動性質來說，他們自認在農村中做社會實踐，比較像是農村工作者或組織工作者。在青年返鄉意象下，青年多半被認為是返鄉「務農」或「創業」，我們比較難在這個意象下深入探討這個透過「居住」對埔里農

1 本文的行動者較常以「農村」來表達非都市或鄉村地區。以農村來表達，反映他們所指涉的這些地區有農民和農業的要素，也反映他們對於農民和農業的關懷。對他們而言，農村不只是相對於都市或城市的地區，還具有政治經濟意涵：它是被漠視的（但很重要）、是被犧牲的（因為發展工業的關係）。本文大都以農村來表達非都市或鄉村地區，是順著研究對象的口語和理解脈絡而來的。

2 相關報導還可參見〈埔里文化造鎮〉（聯合晚報，方紫苑，1990 年 2 月 21 日）；〈告訴你一個藝術小鎮，它的名字叫做埔里〉（新新聞周刊，翁文靜，1989 年 149 期，頁 76-79）。

3 〈返鄉打拚「有家人同在一起」〉（聯合晚報，游婉琪，2013 年 10 月 17 日）。

村做工的青年移居個案。

本文嘗試從「生活方式政治」(lifestyle politics)的視角，來理解這個青年移居團體的農村居住行動，進而討論他們的農村居住行動為什麼是政治的？並且從預示政治概念理解這樣的政治行動如何形成與維持？

生活方式政治意指日常生活選擇（包括消費、交通、生活模式等）的政治化（de Moor 2017）；一種公民的政治行動，反映行動者在某些議題（例如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流失、工人被剝削等）上認知到個人生活選擇的政治重要性（Forno 2023）；藉由個人的生活選擇打破私領域和政治參與的分野（Micheletti and Stolle 2012）。以這個視角來看，移居農村可理解為生活方式的選擇，且此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是政治行動，具有政治意涵。

移居農村的 lifestyle 選擇為什麼是政治的行動？本文借助預示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的概念來說明。預示政治是一種政治實踐，此實踐消除了手段和目的、現在和未來之間的落差（Maeckelbergh 2011）。以此概念來理解移居農村，可說明移居農村的生活方式選擇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為此政治實踐以生活方式實驗為手段來體現未來的目的。我們會發現本文討論的青年移居團體，他們的生活方式選擇具政治意涵，是因為他們藉由生活方式實驗，預示「農村好生活」的未來目的。就手段和目的之分而言，生活方式實驗代表的是手段，農村好生活是目的；就現在和未來之分而言，生活方式實驗代表的是現在，農村好生活是未來。生活方式實驗可以說是在當下體現未來目的的手段。經由預示政治對移居農村的生活方式選擇進行概念化，得以呈現此生活方式選擇的政治意涵。

本文首先說明將青年移居團體的農村居住行動當成生活方式政治的知識基礎，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接續的個案分析說明埔里這個移居地如何成為生活方式政治的實踐場域，促發青年住進農村展開生活方式實驗的引導機制，維持此生活方式實驗遇到的關卡，以及行動者做出的回應行動和行動的效應。結論則針對「逃離」、「自由空間」

(free space)、「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等概念性問題提出看法。

## 二、青年移居農村作為生活方式政治？

相較於遷移視角，我認為生活方式政治視角更能捕捉青年移居農村的政治意涵。問題在於，青年移居農村在什麼意義上稱得上是政治的實踐？這樣的政治實踐如何形成與維持？本文藉由預示政治和自由空間概念，解讀青年移居農村的政治意涵，進而分析預示政治如何形成與維持。

### (一) 遷移視角

本文將「生活方式移居」(lifestyle migration) (Benson and O'Reilly 2009)、「逆都市化」(counterurbanisation) (Halfacree 2008; Halfacree and Rivera 2011) 視為遷移視角。這兩個概念反映不同學術社群的旨趣，但彼此之間不乏連結和互動（例如 Halfacree 2014）。生活方式移居關注尋求更好的生活而重新安置居住地的現象，運用這個概念的研究者，注意到相對於一般人而言，這些尋求更好生活的生活方式移居者，較富裕且有特權 (Benson and O'Reilly 2009)；移居農村，對他們而言是屬於農村田園追求者 (the rural idyll seeker) (Benson and O'Reilly 2009)。令人好奇的是，較富裕且有特權的農村田園追求者是指認移居農村青年的關鍵屬性嗎？就本文討論的青年移居農村行動來說，農村田園是這些青年的主要追求嗎？以及，從世代比較的觀點來說，選擇移居農村的青年，特別是 1980 到 1990 年代出生的世代，得以被認為較富裕且有特權嗎？「崩世代」(林宗弘等 2011) 的觀點似乎告訴我們不是這麼一回事。

逆都市化研究關注從都市地區到農村地區的移居現象，討論農村有什麼特質與氣氛，吸引原本不屬於農村的都市移民，而相關討論都指向鄉村性的拉力對移居農村產生的作用 (Halfacree 2008; Halfacree

and Rivera 2011)。特別的是，在逆都市化的研究議程下，本文的個案也成為王驥懋 (Wang 2023) 討論逆都市化的部分樣本。王驥懋的研究指出移居者與當地農村環境的直接接觸所產生的情感氛圍，是移居者繼續留在埔里的關鍵，並以「農村事件氛圍」(rural eventful atmospheres) 來概念化促進移居者留下來的環境因素。這個分析對移居者與當地農村如何緊密互動提出深入的觀察。不過，這個以農村事件氛圍來解釋移居者為何到鄉村、又為何留下來的研究較沒有討論青年在什麼時空背景、外部因素下被驅動成為移居者，以及有哪些環境以外的因素讓移居者得以續留農村。此外，他以「逃離到鄉村」(escape to the countryside) 作為文章的主標，似乎意謂文章中討論的移居者都是逃離到鄉村的例子。可以問的是，以逃離概念化「穀笠合作社」移居埔里的移動，精確嗎？

事實上，在生活方式移民和逆都市化的討論中，移居農村通常被視為一種逃離，也就是從某個地方和某件事逃離，逃離到自我的願望所在和新生活 (O'Reilly and Benson 2009: 3)。此外，無論生活方式移居或逆都市化，大都把逃離到農村視為尋求更好的生活的行動 (Benson and O'Reilly 2009; Benson and Osbaldiston 2016)。不過，我認為應有比逃離更貼切的概念，來理解像移居農村行動的政治意涵，這時候就得把視角切換到生活方式政治。

## (二) 生活方式政治視角

生活方式政治是發展中的分析概念，可追溯自 Anthony Giddens (1991) 指認出與解放政治有別的生活政治 (life politics)。對 Giddens (1991: 210-215) 而言，解放政治展望的是個體和群體從對其生活機遇有不良影響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生活政治則是一種選擇的政治，一種生活決策的政治，關心的是源自於自我反身性計畫的辯論和爭論。亦可說，解放政治是一種生活機遇的政治，生活政治則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政治 (Giddens 1991: 214)。

在 Giddens (1991) 之後，社會運動研究和政治學研究都曾針

對生活方式政治現象做研究。如同 Mike Featherstone (1987: 55) 指出，在當代的消費文化中，「生活方式」隱含個性、自我表達和風格的自我意識，舉凡一個人的身體、服飾、言語、休閒娛樂、飲食偏好、家屋、車、假期選擇等，都是個人的風格、品味和個性的指標。Francesca Forno (2023: 267) 也指出生活方式政治涵蓋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本文將生活方式政治的討論聚焦在與居住相關的生活方式，把移居農村視為生活方式政治。

類似的討論，在台灣有立基於本土現象的「重回土地」（李丁讚 2010；蔡晏霖 2015）、「農藝復興」（蔡晏霖 2016），這些研究都指出人們往農村去的行動具有政治意涵。重回土地是在災難社會的脈絡中對於土地商品化的反思，進而提出新的出路（李丁讚 2010）。接續重回土地的概念，蔡晏霖（2015）、陳瑞樺（2016）聚焦 2010 年以來的「新農運」，試圖理解年輕人重回土地行動的政治和文化意涵。同樣是在新農運的脈絡下，蔡晏霖（2016）以農藝復興概念重新詮釋當代的新農浪潮中的歸農行動特徵。李丁讚（2016）認為，農藝復興是重回土地的過程，這個過程隱含人文主義的轉變：從「離開土地」的文藝復興到重回土地的農藝復興。蔡晏霖（2015: 311）指出，帶領新一代青年踏上返土之路的賴青松，正是一個社運青年決定拉長戰線，從此在生活中反抗，以生活來反抗的代表。值得思考的是，這樣的反抗有什麼理論意涵？

「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是理解這種反抗的概念之一，提出此概念的黃應貴（2021）指出社會運動不只是大家熟悉的街頭遊行、示威和抗爭，日常生活中消極卻能產生抵抗效果的行動，也可以被視為社會運動。雖然尚未明確界定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究竟是什麼，但黃應貴提醒讀者，人類學的抵抗研究傳統（例如 Scott 1985; Comaroff 1985）曾界定出不同於大家熟悉的街頭遊行示威與抗爭的日常形式抵抗，這些抵抗是理解社會運動不可忽略的面向。不過，我們也看到重回土地、農藝復興試圖揭示的反抗，不只是消極的日常形式抵抗，反而更接近 Ross Haenfler 等人（2012）揭示的生活方式運動（lifestyle

movement），這也說明即使移居農村的行動有政治、抵抗、社會運動等意涵，仍有進一步被概念化的空間。

### （三）移居農村的預示政治

預示（*prefiguration*）或預示政治，是一種特殊政治實踐的表達，這個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青年農村居住行動的政治意涵。*prefiguration* 源自拉丁語 *praefigurare*，是由字首 *prac*（意指「之前」）和 *figurare*（意指「再現」、「描繪」）組成的動詞，字面意思是預測或再現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Monticelli 2021: 106）。這個概念可追溯自 Carl Boggs（1977: 100）提出，一種直接攻擊「國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邏輯，在這個脈絡中的預示是「在一個運動的政治實踐中，作為終極目標的社會關係、決策、文化和人類經驗等形式的體現」。時至今日，預示在政治抗議的敘事中已是重要的概念（Yates 2015a）。

預示政治概念已經被辨認出三個關鍵特徵：打破手段與目的之分、打破現在與未來之分、打造實驗或替代方案。<sup>4</sup>「預示政治」的概念有助於讀出移居農村的 lifestyle 政治意涵：移居者以 lifestyle 為手段，體現某種理想或政治性目的。將青年移居個案界定為預示團體，可以問具有預示政治意涵的移居農村行動是怎麼出現的？若是行動得以持續，則可追問這樣的行動如何被維持？

預示政治的研究隱約指出預示實踐發生在特定的所在地（*locus*），也就是自由空間，例如佔領運動紮營的公共廣場（Reinecke 2018; van de Sande 2013; Asara and Kallis 2023）、佔屋運動的社會中心（Creasap 2021; Yates 2015a, b; Dussault 2022）等。

Sara M. Evans 與 Harry C. Boyte 奠基於民眾運動發展的社會史，結合公共空間和民主自治組織的自由，提出自由空間概念（Boyte

---

4 例如 van de Sande（2013）指出，在當下實現未來的理想、此實現（*actualization*）具實驗特徵、手段—目的之分（*means-ends distinction*）的重構；Yates（2015a）指出，打造替代方案、手段等於目的、未來導向。即使他們的用詞不完全一樣，但標明的特徵相去不遠。

2005: 61)，指涉一種特定的環境，人們在其中能學習新的自尊、深刻且堅定的群體認同、公共技能、合作和公民美德等價值。簡言之，自由空間是私人生活與大尺度制度間的環境，公民在其中可以有尊嚴、獨立和有遠見地行事（Evans and Boyte 1992: 17）。

自由空間與預示政治的關聯，如同 Francesca Polletta（1999: 3）所指出的：在自由空間的密集互動網絡中，人們得以展望替代的未來，並策畫實現的策略。這也就是說，自由空間是生成預示政治的有利環境。這樣的環境具有什麼特徵呢？社會運動研究大致上都採取 Polletta（1999: 2）的界定：社區或運動中「遠離主導團體的直接控制」的小規模環境，可以產生在政治動員之前或伴隨政治動員的文化挑戰。

相較於 Evans 與 Boyte 強調自由空間環境得以觸動密集、深入的公民學習，進而引發公民行動；Polletta 等社會運動研究則是強調自由空間環境具有「遠離主導團體的直接控制」特徵，因此得以產生反抗意識或認同。

在自由空間的概念脈絡下，移居農村的目的地具有自由空間的性質。我們可經由此概念深入探討作為自由空間的移居地環境具有什麼特徵，以及這特徵如何促發預示行動。這樣的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移居農村的預示行動如何形成。

至於預示行動如何維持呢？資源和過程其實同樣重要。強調資源重要性的 Polletta（1999）認為，預示團體若要成為持久的團體，需藉由提供服務（例如醫療保健、食品、教育等），為往後的動員找到領導者與參與者。這意謂著他們提供的服務要與主流服務提供者競爭，並取得成功，才有機會找到被動員者。Luke Yates（2021）也指出，再生產（或資源的維持）是預示團體能有效動員，讓改變社會的計畫成真的重要策略面向。這個觀點與資源動員論的看法一致，基本上都認為預示和社會運動一樣，都需要動員，而動員需要資源，因此資源的獲取與維持無比重要。不過，資源的獲取只是預示行動的部分面向，預示行動最關鍵的可能還是在手段與目標的聯繫。

這時候我們可以借鏡 Marianne Maeckelbergh (2011) 的分析，他透過預示政治概念來解讀的另類全球化運動 (alterglobalization movement)，發現運動者透過預示的策略性實踐，去實現自己渴望的社會變遷。他在運動現場觀察到，「過程」最常被用來表達預示，運動參與者除了最抽象的渴望——另一個世界——以外，並沒有共享一致的目標、對手和認同，他們在意的是邁向另一個世界的過程必須是民主、透明、可及的，以及不要成為自己反對的對象 (Maeckelbergh 2011: 8)，這意謂著什麼樣的過程對他們而言是重要的。也就是說，同樣要邁向另一個世界，但過程若是不民主、不透明、不可及，就會被運動者拒絕。因此，掌握預示行動者以什麼樣的過程邁向目標，對於理解他們的預示行動如何持續來說是重要的。

移居農村的預示行動者在邁向一個抽象目標，或在預示某種理想的未來時，當然無法置資源於度外，想要在農村持續生活，他們一方面要實踐理想，另一方面要面對現實。於是要掌握穀笠合作社的預示行動如何維持，就得觀察他們的生活方式實驗在面對主流經濟時如何從中取得資源，又如何經由非主流的實驗過程邁向農村好生活的目標。

###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透過參與觀察、訪談、相關文字資料蒐集等方式，取得個案資料。研究者藉由參與觀察與研究對象直接互動，可以看到田野場域中數量眾多的互動細節、事件或插曲；訪談和相關文字資料蒐集，則是研究者追溯個案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必須仰賴的資料管道。

在參與觀察方面，我在偶然機會下於 2012 年 5 月進入埔里的籃城，在這個距市中心區將近五分鐘車程的農村聚落中，看到了與本文討論的移居個案有關的學習活動。2013 年 5 月，本文討論的行動團體在籃城展開居住實驗沒多久，我經引介而進入他們的實驗基地「籃城好生活」，並與其中的居住實驗者初次互動。我在第一次互動便對

他們的實驗留下深刻印象，之後也頻繁參與他們的活動，像是拜訪農友、農事、共餐等。他們的幾個重要場合，像是「放伴米」的命名、穀笠合作社的成立、青年培力工作站計畫提案等，我也都在現場。

我在 2016 年 8 月浮現以他們為研究對象的想法，並開始把參與的觀察、心得、反思寫成田野筆記。2018 年底到 2019 年，穀笠合作社經歷轉換的過渡階段，我參與其中的討論，但身在其中的我，一時之間還看不出發生什麼事。2020 年中，我逐步蒐集相關文字資料，藉以整理穀笠合作社的大事記與發展歷程。2021 年 5 月起開始訪談，更仔細地掌握穀笠合作社的發展脈絡和轉折過程。主要的訪談對象與時間如表 1。

表 1 訪談對象與日期

| 代稱 | 身分      | 訪談時間（年 / 月 / 日）                                     |
|----|---------|---|
| A1 | 穀笠合作社成員 | 2021/5/1, 2021/8/18, 2021/12/17, 2023/4/7, 2024/6/3 |
| A2 | 穀笠合作社成員 | 2021/5/16, 2021/8/18, 2021/12/17                    |
| A3 | 穀笠合作社成員 | 2021/8/17, 2021/11/4                                |
| B1 | 大學計畫人員  | 2021/9/2, 2021/11/5                                 |
| B2 | 大學教育工作者 | 2023/3/11   |

訪談進行以前，我對個案已有基本的了解，因而每一次訪談都可以奠基於既有的了解，向報導人進行資料或訊息的確認、追問和討論。每一次訪談，經取得報導人同意而錄音；訪談後將錄音檔轉成分析用的逐字稿。在訪談進行階段，穀笠合作社也逐漸走出過渡階段，呈現現階段的輪廓。經由訪談，我和成員共同檢視過往，我過去較看不清楚之處，也逐漸清晰。

由於是單一個案的分析，研究分析需對於微觀資料嚴謹考證，因此我一再推敲細微的人、事、物或想法對於這一生活方式政治的形成與維持產生什麼影響；留意各種細節發生的先後順序，以避免弄錯先後順序而推導出錯誤的因果關係；並且由不同來源的資料驗證相關說法是否為真。

我的研究在他們知情的情況下，在資料蒐集上獲得不少幫助。例

如，他們告知活動訊息時，通常不是問「你要不要來參加」，而是說「你要研究我們，就應該要來參加」，或是「參加這個對你的研究應該會有幫助」。研究期間，還有幾次活動或會議，因為疫情的關係或其他因素，我無法現場參與，他們便讓我透過直播看現場的狀況，或者協助錄音。強調互相幫忙的他們，幫忙的對象不限身邊的農民和返鄉青年，還包括需要做研究的我。

本文的書寫，是分析成果的呈現。我除了期待本文可供學術社群閱讀，也期待能供研究對象閱讀。供學術社群閱讀的目的在於促進知識的交流與生產；供研究對象閱讀期待提供一種分析的角度與行動意涵的解讀，讓他們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看自己。

本文保留地名的原稱，僅對人名做匿名處理。保留地名原稱的考量是個案所在地的名稱和行動團體的實作緊密連結，在這種情況下，要了解某些行動勢必無法脫離該行動的發生地。例如籃城好生活這個居住實驗的想像和實踐連結了籃城這個地方，若把籃城替換成代號，例如「LC 好生活」，便難以呈現這個連結特定地方的行動想像和實踐。本文因此保留地名的原稱，避免讀者因代稱的地名而對行動的理解出現障礙。人名的部分，雖然沒有匿名後可能造成文意了解困難的疑慮，但若以代號稱之，呈現的會是去人化的行動，這應不是理想的呈現方式。因此除了在涉及較敏感的地方政治討論時對相關人士匿名，其餘皆以接近暱稱的方式，對人名做半匿名化處理。

## 四、埔里： 一個預示農村好生活的移居地

### （一）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在埔里

2011 年上半年，教育部公開徵求「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提案。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是「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的子計畫之一。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是教育部顧問室呼應全民進大學、企

業界的需求、行動／問題導向學習、整合型課程的趨勢等時代背景，並且基於培養現代公民核心能力的目標而提出的（林從一 2014）。顧問室期待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達成幾個目的：一、完成以校為單位的教育環境營造、二、加強通識教育之全校性參與、三、提升大學課程之統整性與融貫性、四、強化學生之學習動機與方向性（林從一 2014）。到了下半年，位於埔里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暨大）在申請通過後開始執行此計畫。

2011 年 11 月，原本在社區營造學會任職秘書長的阿彬，南下埔里，接任暨大「水沙連行動辦公室」（以下簡稱水辦）的執行長，專責推動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水辦是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工作小組，主要成員除了阿彬，還有剛從暨大畢業的阿君等五個人。

接下水辦任務的阿彬，對計畫中的「大學城」概念較有感覺。大學城被放進暨大的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帶有這樣的期待：透過各種方式引導，讓學生「更加認同在地的人文與自然環境，甚至逐漸從『過客』的消極心態轉變成積極改造環境的『居民』角色」。<sup>5</sup>事實上，大學城是地方人士長期的發展想像，早在暨大設校前，地方上就期盼藉由大學設校來發展地方。2011 年，暨大把大學城寫進計畫書，也是對地方期待的呼應。

阿彬在埔里的前半年，一方面享受埔里的生活，另一方面思考手上的計畫怎麼做才比較有意義。住進埔里的他，每天晚上在埔里和附近的魚池「晃來晃去」（訪談紀錄 2021/9/2），就在這「繞、繞、繞，跟各式各樣的人交朋友、認識」的過程，他發現埔里充滿學生可學習的場域，例如指紋市集、咖啡班張班長的工坊、陶藝師傅的工廠、日月人文藝廊、河堤餐廳等（訪談紀錄 2021/9/2）。

## （二）「大學城」想像：如何連結大學與社區

阿彬在第一次辦公室會議中，向同事勾勒水沙連大學城願景：

---

5 引自暨大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書。

希望多年後，許多人對埔里的印象除了藝術小鎮之外，還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大學城」。許多年輕人想來暨大就讀，是因為這裡的大學生活真有趣，年輕人可以在此閱讀一本「地方」的大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015: 173）

2012 年 1 月，阿彬提出大學城的推動策略：連結大學與社區。這個策略有兩方面的設想，一是在課堂外開創「學習據點」，成為學生學習、知識與行動探索的場域；二是期待學校師生幫助社區發展、解決現實的問題。<sup>6</sup>阿彬逐一拜訪、認識的場域陸續成為計畫推動上的學習據點。此外，他也構思埔里的「農村」社區在學生住進去後可能會產生的樣子。他以籃城社區為例，勾勒一個「空掉」的農村因為學生住進去後產生的景象：

像籃城社區位處埔里的北邊，她其實是空掉的社區，因為年輕人、小孩子愈來愈少。可是，她能不能變成是暨大學生喜歡去住的地方？因為暨大學生去住就會開始有早餐店，晚上有人在那邊討論事情，那邊的居民也可以找到一個好方法，不怕暨大學生吵……學生進去了，這個社區就熱鬧起來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015）

在水辦的推動與號召下，暨大學生一個一個進入上述的學習據點。對阿彬而言，學生進入各個學習據點，參加埔里各式各樣的活動，透過實作與實習和更多的鎮民產生緊密的互動，就可能對埔里鎮更多的層面產生興趣，不再只是享受民主社會的學生，而是會關心別人的公民（訪談紀錄 2021/9/2）。

不僅如此，阿彬也希望有學生能住進「空掉」的農村社區中，去幫助社區發展並解決現實問題。相較於只是進入學習據點和鎮民互動

---

6 引自〈大學城推動策略芻議〉（2012 年 1 月 11 日）。

的學習活動、實習或實作，住進農村社區中的入住者不是活動時間到了才蒞臨社區，他們需要離開熟悉的宿舍，進入不熟悉的在地社群，還要嘗試融入，以參與當地的公共事務為目標。阿彬期待學生藉由「居住」來從事公民參與，背後是一種「書院」的想像。

書院是暨大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提案項目之一，其原型是英美的住宿學院（residential college）。2008年初，清華大學、東海大學、政治大學分別宣布在9月開始的新學期，推出清華學院、博雅書院、政大學院等學院式教育。這種學院式教育的特色是集中住宿、特色課程、名家導師。<sup>7</sup>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策劃者期待大學發展住宿學習，將宿舍區營造為生活學習圈，讓學生在完善的導師輔導體系、精緻的教學活動、優質的環境中學習（林從一 2014: 242）。

阿彬的書院想像，源自清華學院的刺激。2011年12月，阿彬邀請一位清華學院的導師到暨大分享書院的經驗；後來又帶著暨大的老師到清華大學參觀學院推動情況。阿彬在交流過程中看到清華學院的學生因為有「空間」，又有「導師」的陪伴跟引導，而充分利用非課堂時間，在緊密的社群互動中創造了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訪談紀錄 2021/9/2）。他對清華學院成效有感，但挑戰是如何在有限的物質條件下為暨大的學生創造書院的空間和導師？思考如何在暨大落實書院的他這時候把焦點轉向校園之外的農村：

如果暨大學生可以住到埔里的村落，一方面他們可跟村落的長輩比較直接的互動，感受農村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農村的閒置空間多，如果生活在農村，享用農村的一些環境、資源，然後創造農村空間的魅力、內涵。那麼，一個村落就可以是一個書院，村落就是「窮大學的書院」，藍城就是暨大的書院。（田野紀錄 2019/12/15）

---

7 〈東海博雅書院 大師陪讀〉（聯合報，喻文玟，2008年2月25日）。

### （三）空掉的農村：籃城

2012 年上半年，一門「社會參與式課程」讓籃城進入大學城的藍圖。社會參與式課程是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項目之一，阿彬邀請校內和校外老師來開課。有「社區建築」專業背景，曾參與過九二一和八八風災重建工作的阿民，是受邀開課的校外老師之一。阿民開的課是「參與式社區規劃」，他希望教導學生參與式社區規劃的基本技術，實作場域選在籃城。他在九二一地震後就進入這個社區提供協助，對這裡的人和環境都相對熟悉（訪談紀錄 2023/3/11）。

阿民發現籃城的聚落結構完整、墾拓歷史豐富、族群文化依稀可見，也有當代「農村」常見的議題，例如人口老化、少子化、青壯人口斷層等，而這些聚落特徵和農村的議題在學生進入社區之後都被看到了。<sup>8</sup>

2012 年 5 月初，課程準備進入籃城社區實作。在此之前，阿民已經在課堂上教授基本技術，並在暨大校園練習實質空間的調查。在暨大校園的空間調查練習後，阿彬和阿民引導學生討論大學與埔里之間的關係，讓學生思考除了租賃學生套房、飲食、購物之外，學生是否有可能與埔里發展出其他的關係？如果大學生搬離學生套房，住進青年人口外流的農村社區，他們的活力、創意會與凋零的農村社區擦撞出什麼火花？<sup>9</sup>

他們討論籃城的隱憂，也問學生「社區再增加哪些條件可吸引年輕人住進去？」兩位老師帶同學從籃城這個地方去認識台灣農村普遍的問題，<sup>10</sup> 引導學生思考在籃城有沒有好生活的可能。籃城好生活這五個字在這樣的討論中不經意從阿民或阿彬的口中說出，聽到這五個字的阿君開始期待籃城好生活的未來（訪談記錄 2021/8/17）。他基於「一個有問題的農村，也有可能性」，以及「在一個農村裡面生

---

8 引自阿民在 2012 年 9 月 28 日社參課程成果發表會的說法。

9 引自 104 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創業營運計畫書。

10 引自〈籃城好生活的最起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105 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成果報告書》附錄，2016 年）。

活，也可以有好生活的願景」等體認（訪談紀錄 2021/8/17），而對「大學生（年輕人）住進一個青年人口外流的農村社區可以過怎樣的生活」產生期待。<sup>11</sup>

一週後，阿民邀請在雲林莿桐開辦「農村生活實驗室」的廖建築師到課堂上分享。廖建築師的經驗引發阿民在摘要總結時試圖向同學傳達，在少子化、老年化的情況下，農村還面臨青壯人口中空化，若不投一些年輕人口、新產業進到農村，未來農村是可能消失的（訪談紀錄 2023/3/11）。阿民的一句「再過二十年，沒有人去關心台灣農村的話，台灣的農村會消失」震撼了幾個同學，其中一位是阿君。阿君聽到這席話，當下第一個反應是難過掉淚，希望農村不要消失。他之所以會有那麼強烈的反應和心願，跟他小時候常去外公、外婆家的生活經驗有關。他想到的是四十年前的雲林農村，不希望那些經歷過的、喜歡的農村景象消失（訪談紀錄 2021/8/17）。

構思「窮大學的書院」的阿彬，也參與這門課的討論與調查。他看到藍城在埔里發展的過程中留下的故事（例如九二一地震後南投縣政府計畫將埔里行政中心遷往藍城、居民反對在藍城設置瀝青廠等），以及社區因為年輕人離去留下的「空」。這時候，他開始向水辦同事阿君提議：「不要住在宿舍裡頭，就搬出來住」（田野紀錄 2019/12/15）。為了勸說阿君，阿彬還曾到阿君住的宿舍，聽阿君講有多麼適應宿舍的生活，但阿彬不為所動，持續向阿君鼓吹「住在個人套房宿舍多無聊，要不要搬出來，搬出來可以怎樣、怎樣……」。<sup>12</sup>

阿彬這麼鏗而不捨，應是「窮大學的書院」想像所驅動。對阿彬來說，農村可以撐起書院的氛圍，學生住進去，可以活化農村的空間，並且更認識農村，晚上可以在住宿的大廳互動、串門子，而且是混齡，這就是一種「窮大學的書院」的圖像（田野紀錄

---

11 同上註。

12 引自阿君的回信紀錄（2024/10/31）。

2021/2/19)。

對阿民而言，年輕人口外流、青壯人口中空，留下的是農村中的「閒置空間」或「空屋」。在南部大學任教的他，曾帶學生在學校鄰近的村落做過閒置空間調查，發現農村中確實有很多空屋，於是想到那些沒人住的空屋可以讓人住進去，再讓入住者發揮專長，幫助社區發展。阿民經由課程實地調查，發現籃城存在不少閒置空間，他和阿彬一樣，想媒合學生住進去。寶藏巖空間的活化和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中的藝術家駐村案例，曾經給他很大的啟發，這兩個案例都讓他體認到：不管是要活化閒置空間或社區，都要讓人住進去才有可能；讓人們住進去，即使入住時的環境很糟，也會被慢慢改善，這是靠規劃做不到的事（訪談紀錄 2023/3/11）。他不期望學生住進籃城後創業，而是期待學生可以依自己的興趣或專長，對社區做出貢獻，而社區也能有東西回饋給學生，雙方形成互助共享的關係（訪談紀錄 2023/3/11）。

就在阿君被鼓勵搬進籃城之際，社區總幹事阿芳已經受阿彬和阿民的請託，在社區中尋找可以讓學生入住的空房子。到這裡，作為移居地的埔里，已經不只是人們為了追求特定生活方式而移居的目的地，這個移居地還被賦予農村的性質，具有促進青年公民參與的潛能，是青年得以藉由生活方式選擇預示「農村好生活」的行動場域；籃城則是青年得以透過生活方式選擇預示「籃城好生活」的行動場域。這個行動場域的形成，是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埔里的實作團隊在大學城想像下，延伸出一系列實踐方式，包括連結大學與社區、學習據點、書院等，並且以農村的關懷和視野，重新看待在地社區，進而逐漸確立的行動利基：農村中的「空隙」（interstice）。這些空隙是年輕人口離去後，留在農村的消失危機和閒置空間。在大學城想像的大學公民培育計畫下，消失危機被認為是青年需要面對的結構性問題，閒置空間是青年得以入住、展開行動的實質空間。

## 五、生活方式政治的形成： 籃城好生活實驗

從被鼓勵到正式住進籃城，中間隔了將近十個月左右的時間。這段時間，有三個關鍵機制將有籃城好生活想像的青年引導到預示實踐的軌道，包括：創新實踐的思維、新農運理念的社區實踐、農村中居住實驗空間的出現。創新實踐的思維啟發青年轉從預示的觀點看結構問題，新農運理念的社區實驗形塑青年的預示實踐標的，農村中居住實驗空間的出現則讓青年得以在一個能夠引發密集且深入的公民學習環境，或說自由空間，實驗籃城好生活的理想。

### （一）創新實踐的思維

2008年金融海嘯後，青年失業率攀升、勞動市場變動越來越大，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陳東升教授意識到必須採取行動。<sup>13</sup> 2011年，陳東升在社會學系開授「社會經濟組織的創新與設計」，這門課要求學生必須整合大學知識訓練，深思社會的重大現象及重大課題，並且結合個人與團隊的所有能力，提出具體的解決策略。<sup>14</sup>

2012年7月30日到8月4日，陳東升與阿彬合作，在菩提長青村舉辦「社會經濟組織的創新與設計」研習營，研習內容包括：社會經濟理論授課、社會經濟案例介紹、學生設計實作方案成果發表、在地小旅行等。在阿彬的邀請跟鼓勵下，對於社會經濟有興趣的暨大學生、在地行動者和社區大學工作夥伴都前往參加。

部分暨大學生在這次研習營期間意識到「可能性」的存在。例如，在暨大就讀社工所一年級的阿葳分享：「因為自己反對資本主

---

13 〈社會學老師狂想 一堂課改變台灣〉（天下雜誌 592 期，李映昕，頁 128-131）。

14 引自《社會經濟組織的創新與設計研習手冊》。

義，關於資本主義的疑惑在學校班上的討論是『無解』，但在這次的研習營中卻看到『可能性』，聽完之後會想找人一起去社區做做看，希望找有志一同的夥伴一起加入。」<sup>15</sup>阿葳受社工所一位老師影響，想要找到修正資本主義的方式，剛好和這次研習營的精神不謀而合，因此當他看到研習營的訊息，便邀集有相同理念的同學一起參加。在聽過陳東升授課以及同學的方案分享後，阿葳和同學想在埔里找一個社區操作合作經濟或社區經濟，卻發現他們來埔里一年了，對於埔里的認識還不多，因此想要找個社區駐點，從深入認識社區做起。<sup>16</sup>

研習營結束後，阿君寫信給陳老師分享研習營中的感動與心得。陳老師在回信中寫到的「要改變台灣深層的問題，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影響阿君對結構問題的看法。阿君發現在面對看似巨大、無法改變的大結構問題上，陳老師竟是在探問「可能性」，而不是像一般人覺得「很難」或「沒辦法」。阿君在研習營中已經見識到陳老師的短講、介紹國外創新案例的功力，從信中感受到陳老師的探問溫和且溫柔，卻有嘗試去實踐的深厚底蘊。這在他心裡種下一顆種子，賦予他在面對結構性問題時，有「做做看，再調整，再修正，不要怕」的態度。雖然只是一句話，阿君感覺到自己像是被某種風拂過，被「面對深層的結構性問題的創新實踐風氣」給影響了，<sup>17</sup>而這種創新實踐的思維具有預示意涵的實踐邏輯。

## （二）新農運理念的社區實踐

2012年9月10日，《上下游新聞市集》報導南投縣政府即將「收回」埔里內埔的農地，給一家礦泉水公司擴廠。由於這篇報導獲得太多關注與迴響，在臉書上也引發熱烈討論，水辦成員都注意到這件事。阿彬和同事討論後，決定要有所行動（訪談紀錄 2021/8/17），於是邀請《上下游新聞市集》的主編小非到埔里，並在

---

15 引自〈8/1 晚間暨大團聚：心得分享〉。

16 引自水沙連行動辦公室記錄活動的影片。

17 引自阿君的回信記錄（2024/10/31）。

9月17日晚上，在埔里鎮上的河堤餐廳辦理一場公開講座。講座中討論農地農用、土地徵收、埔里農業的未來等議題，<sup>18</sup>有四十幾位來自不同領域、關心相關議題的人士參加（吳宗澤、蔡嘉信 2017）。

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發生在埔里農村的公共議題，促使大學城願景下的公民學習場域與新農運的理念（例如農業農用、土地徵收等）產生銜接。阿彬身為新農運行動網絡的一員，也藉機邀請這個行動網絡內的成員到埔里，與在地的鎮民和學生討論相關的議題。

小非在9月17日晚上的講座中，介紹台灣的農田，從南到北因為工廠的出現而一塊一塊消失，阿君聽了非常難過，再次想起小時候在外公、外婆家鄉的農田，綠油油的，在陽光下發亮、風吹過形成波浪，很美，然而這樣的景象竟然正一塊一塊地消失中。這讓他浮現「這種好的東西應該讓它至少要有保留，不能完全消失」的想法（訪談紀錄 2021/8/17）。

講座後，一群學生決定組成聲援團體「內埔農業後援會」，由阿葳擔任召集人。內埔農業後援會首先展開內埔農民的訪調。訪調行動結束後，成員阿澤提議實際在內埔租一塊田，以共耕作為下一步的行動。於團隊來說，阿澤認為缺乏農事經驗的學生可經由種田，對農民處境更感同身受（吳宗澤 2019）；於他個人來說，他本來就渴望自給自足的生活，共耕正好提供實作的機會（訪談紀錄 2021/5/1）。在這個提議獲得其他成員的支持，一位內埔農民也願意提供一分地的情況下而能夠被落實。此共耕行動於2013年3月展開，並維持了一個稻作期。

在內埔農村的公民參與期間，阿君、阿澤、阿葳經常一起討論，特別是與農村有關的議題，「慢慢形成三個人能一起做事的感覺，好像找到志同道合的伴」。<sup>19</sup> 早先經創新實踐的思維洗禮而具備預示實踐邏輯的他們，這時候產生了情誼，建立了夥伴關係，並有農村議

---

18 引自〈2013夏耘訪調——埔里線〉（張森葳，未出版文章）。

19 引自《青秧敘時》（劉力華編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102級畢業製作〔實務組〕，頁18）。

題這個更具體的施力標的。自此，他們在面對農村議題的當下，始終看著遠方的問題，給出行動，再從行動經驗修正，再給出行動。過程中；他們抱持期待，從行動中看見可能性，也有失望、挫折、無助的時刻，再看見一點可能性時，又產生期待，重新修正再行動；因為沒有人知道不可行，所以只能做做看，或試試看。<sup>20</sup> 這時候他們已經不只是進入學習據點學習的學生，還是積極公民，除了知道土地問題、農村問題的重要性，更嘗試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努力，甚至逐漸成為以創新實踐的思維面對農村議題的預示行動者。

### （三）農村中居住實驗空間的出現

2013 年年初，經由阿芳的引介，阿彬陸續獲知籃城社區中有哪些空房子可讓學生入住。一起走在籃城時，阿彬會指著一間一間的空屋，向阿君說：「這間可以住，要嗎？」另有一次在社區活動結束後，阿彬、阿芳帶著阿君、阿葳和阿澤走到籃城某鄰長家門口，告訴他們：「對面可以住。」這時候居住實驗的空間是到位了，剩下就是成員們的態度了。3 月 9 日埔里舉辦單車漫遊那天，水辦一行人騎經過那裡，阿彬特別停下來，告訴大家：「這是以後阿君要住的地方，以後大家可以來找他聊天。」實際上阿君那時仍在猶豫，對於阿彬篤定的口吻感到一些驚扭，也想對阿彬生氣。<sup>21</sup>

對於住進籃城這件事，阿葳是最積極的，夥伴問他：「為什麼這麼想要住在一起？」他說：「因為找到伴，可以一起做事，跟社區一起做社區想做的事。」<sup>22</sup> 這個說法打動了已有籃城好生活想像，又不希望農村消失的阿君，在居住空間已到位的情況下，逐漸篤定地想把自己放進農村，<sup>23</sup> 「親身體驗農村的好壞」（訪談紀錄 2021/8/17）。至於阿澤，則是帶著「以身為度」的想法住進去。對他而言，以身為

20 引自阿君的回信紀錄（2024/10/31）。

21 同上註。

22 引自《青秧敘時》（劉力華編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102 級 畢業製作〔實務組〕，頁 18）。

23 引自阿君的回信紀錄（2024/6/3）。

度有兩層意涵：一是用身體實踐、讓身體浸泡在行動的脈絡當中，再去發展未來的行動；二是先做再說，先求有再求好（訪談紀錄 2024/6/3）。

至此可以看到將有籃城好生活想像的青年引導到預示實踐軌道的關鍵機制，也可以看到經由這些機制引導而住進籃城的青年，並不是從不好的生活環境或政治經濟體制逃離到農村，而是在生命的某個階段，受到某些鼓舞，選擇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實驗農村好生活的可能性。這種藉生活方式選擇表達農村好生活理想的實踐，可以說是一種預示政治。

2013年3月中旬，他們開始整理籃城〇〇號的空房，準備入住，展開籃城好生活的居住實驗行動。這個行動獲得水辦與青年署「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的一些經費支持。4月21日當天，他們在籃城社區舉辦「入厝」活動，正式把自己介紹給社區居民。他們在入厝的邀請函上寫著：「籃城好生活是我們參與農村社區的行動與想像，邀請大家來看看青年在農村生活的可能。」

在他們入住後，原本的閒置空間，或說空屋，成為他們在社區中的居住所在，也是一起工作的「工作室」，他們也把這間在農村中的工作室當成農村生活實驗的基地。對阿彬而言，這就是由清華學院轉型而來的，一種「窮大學的書院」（田野紀錄 2021/2/19）。從預示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讓青年得以藉由生活方式選擇，表達未來理想——預示籃城好生活——的自由空間。

#### （四）在自由空間展開的生活方式實驗

這個自由空間是一間三層樓民宅，一樓是半開放空間，團隊除了以此為共同工作的工作室空間，還在此經營青年交流平台，藉沙龍、共食、聚會等日常性活動來製造各種有關農村與農業，以及情感的交流。二、三樓是三人的住宿房間，另外有一間可供來訪者住宿的客房，以及一個儲藏空間。他們藉由這個自由空間展開籃城好生活的農村生活實驗，從生活方式政治的視角來看，此實驗是藉由生活方式選

擇表達籃城好生活，或說是以生活方式為手段體現籃城好生活。

在其他學習據點的公民行動是以學習為名，在這個自由空間的公民行動則是以居住為名，此居住行動之所以是公民的（civic），在於行動者一方面透過居住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二方面透過居住創造好生活。這兩方面的公民行動都在籃城〇〇號的居住空間出現後成為可能。

透過居住參與的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包括：媒合暨大服務性社團進社區，協助文書處理、計畫申請與社區活動，活化社區空間，傳承社區文化（如武術）等。大學生透過居住參與這些公共事務，走出校園，與社區產生深度連結；例如阿彬設想的大學城推動策略，除了希望埔里社區成為學生可學習的場域，也希望學校師生能幫助社區發展、解決現實的問題。從社區的角度來看，阿芳發現：「本來沒有人住、堆沒用家具的房子，因為他們住在那裡常常煮飯、常常有人來走動，變得很熱鬧。……他們住在這裡也會不定時參與社區的活動，社區因為這些年輕人變得很有活力。」<sup>24</sup> 年輕人住在社區中，可以更融入、就近參與社區活動，而社區居民和幹部也更容易找到他們幫忙。

透過居住創造的好生活，其實是「公共」生活的意思。以他們在住處一樓空間經營的青年交流平台來說，日常性的沙龍、共食、聚會等活動製造許多交流的機會。在阿彬眼中，這個跟農村結合在一起的青年居住空間，有公共討論的氛圍和充沛的文化活力（田野紀錄 2021/2/19）。此外，這是一個對青年友善的公共場域，青年在這空間比在學校的空間來得自在、放鬆，也因為自在、放鬆，他們比較會發言、無所不談，談的又是公共議題，而不是泛泛之談（訪談紀錄 2021/9/2）。阿君也觀察到這個空間讓學校師生、社區居民、外縣市的講師或訪客同在、認識、交流、探討問題，並且有情感的支持，能夠促成連結跟行動（訪談紀錄 2021/8/17）。

就當下行動與未來理想的區分來說，生活方式實驗是當下的行

---

24 引自 2013 年青年署「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成果報告。

動，籃城好生活是未來理想；就手段與目的的區分來說，生活方式實驗是手段，籃城好生活是目的。在籃城〇〇號的自由空間，則看到居住者透過生活方式實驗去表達籃城好生活的理想、體現籃城好生活的目的。籃城好生活的生活方式實驗，可以說是一種消除現在與未來之分、手段與目的之分的預示實踐。

## 六、生活方式實驗的關卡： 遭遇主流經濟

### （一）從「好生活」到「討生活」

住進農村的生活方式實驗進入到夏季，成員們經歷了很多人要接待、要辦活動、還要去外面參加活動的生活，都有累的感覺，但還是覺得「住在這裡真是不錯」，也想再繼續住（訪談紀錄 2021/8/17）。這時候他們把關懷目標由農村的未來轉向自己的未來，認真討論並想像未來在農村生活的可能；亦即他們的籃城好生活實驗開始產生目標的轉移（goal shifting），從表達性（expressive）的「好生活」到工具性（instrumental）的「討生活」。為此他們笑稱將籃城「好」生活置換成「討」生活可能更加貼切。<sup>25</sup> 從好生活到討生活，意謂的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實驗遭遇了主流經濟。青年在農村「生活」的「生存」問題，開始被凸顯與放大。

怎麼討生活呢？在籃城住了半年，也面臨畢業出路的阿葳說：「我們嘗試在走一條非主流的路，這是一條解決農村問題的路，一種社會創新，或者農村創業，來創造更多在地工作機會給青年，讓青年可以在農村生存下去。」<sup>26</sup>

2013 年末，陳東升這麼鼓勵他們：「若未來要留在農村深耕，

---

25 同上註。

26 同上註。

需要創造生計的可能性。」<sup>27</sup> 2014 年 1 月，阿君北上和阿彬見面。阿彬因為照顧長輩因素，在籃城好生活開始沒多久就離開水辦回到台北，但仍然關心在埔里的年輕人。他在這次碰面中告訴阿君：「新的這一年，你幫我一起想，要怎麼樣讓你們這些年輕人在埔里做自己喜歡，也跟在地有連結的工作」。阿君被阿彬這種為年輕人著想的心意打動了，進而開始思考：「怎麼在埔里這樣一個農村地方，做自己喜歡、有意義和收入的工作？」（訪談紀錄 2021/8/17）他和夥伴們想嘗試一種「和埔里在地的其他人有深刻連結互動」的工作和生活型態，為自己與為其他未來想在農村生活的青年尋找多元的可能。<sup>28</sup> 想留在農村的他們，這時候無法只仰賴水辦的支持和青年署的計畫補助，而是必須自力取得能養活自己的資源，亦即解決生計問題。

## （二）青年在農村的自立平台：穀笠合作社

2013 年 12 月底，內埔農業後援會討論要解散或繼續，如果要繼續能用怎樣的方式等問題。阿澤綜合了現實情況與期待提出契作的方案，此方案大致是這樣被推導：學生希望埔里的友善耕作田區越來越多，但他們在內埔共耕一分田期間已體會到親自下田的不易；契作正好給予這些想推友善耕作，卻無法親自下田的學生一個替代的辦法；此辦法由專業農民扮演生產者角色，學生扮演銷售者角色。這麼一來，學生一方面可經由銷售角色來推廣友善耕作，另一方面可從銷售獲取收益，可謂兼具社會性目的以及在農村討生活目的。經過這一番梳理，與內埔農民契作就成為維持內埔農業後援會運作的方案，也是想留在埔里農村的青年可獲取收入的方式之一。他們後來找到的合作者，是在內埔實踐新農運理念期間認識的老李。2014 年農曆年後，他們找老李討論合作，也獲得同意。在契作方案、合作農友都確定

27 引自〈穀笠合作社個案研究〉（《104 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創業營運計畫書》，郭怡君、吳宗澤，2015 年）。

28 引自〈給主任的文宣〉（成文於 2014 年 3 月 27 日），此文為穀笠合作社成員為商請暨大某位主任協助宣傳而提供的團隊介紹文件。

後，當初為了聲援內埔農民而成立的內埔農業後援會，在重心轉到經濟性的契作後，勢必也要轉型。在2月17日的聚會中，他們便決定將內埔農業後援會轉型成為穀笠合作社，以利契作方案的推動。

穀笠合作社既是內埔農業後援會的轉型，也是取代，更是籃城好生活之外，實驗農村生活方式的另一個平台。如果說籃城好生活是青年在農村實驗居住可能性的平台，穀笠合作社則是青年在農村實驗「生存」可能性的平台。

穀笠合作社在成立之初即被成員界定為青年在農村的「自立平台」。這樣的界定源自想在農村住下來的他們，知道青年住進農村需要討生活，也就是「自立」。對他們而言，一個像水辦或其他社區學習據點一樣，具有串連或連結功能的平台，或許就有助於青年在農村的自立。他們期許自己能先由這樣的平台站起來，進而透過此平台幫助更多年輕人住進農村或留在農村（訪談紀錄 2021/8/17）。標榜自立，反映他們想要靠自己獲取資源、在農村生存，這是一種自主性（autonomy）的追求。

「穀笠合作社」這個名字是阿華取的，稻「穀」與斗「笠」分別象徵作物與耕者；「穀笠」的諧音，傳達他們「鼓勵」人們對土地有更深的情感、更緊密的關係，並能支持我們所處的這塊土地，擁有更美好與友善的未來。至於「合作社」並不是一般理解或政府規範下的法人企業體，而是「合作的社群」（田野紀錄 2023/4/7）。此外，他們以源自農村的本土語彙「放伴」來表達這個平台能促進與體現的合作。

### （三）放伴原則的形成

前述之內埔這個實踐場域提供學生實際接觸農村中各種衝突的機會。隨著聲援和訪調行動的展開，學生親眼見到政府和財團跟農民搶地的景象，與此同時，也看到農民在遭受不公平對待後竟沒有太大的反抗，直覺地產生「為什麼農民不團結」、「為什麼農民不組織起來面對共同的問題」等疑問。

隨著 2013 年 3 月展開的「公田」行動，他們逐漸改變看待問題的角度。自從決定種田以來，可以說每一步都是考驗，包括找地、租地、訂秧苗、翻土、插秧到收割，但整個過程都有農民鼎力相助（吳宗澤 2019: 55）。

2013 年 7 月 24 日，他們在籃城好生活包裝收成的米，同時要為米取名。一位成員基於生產過程中得到農民許多幫忙，提議把米取名為「伴米」，諧音是「伴你」，藉以表示這些米是透過集體的力量，互相陪伴才有的收穫（吳宗澤、蔡嘉信 2017）。我當時也在現場，提議以「放伴米」來命名，賦予這批米「相放伴」的意義。我當時認為相放伴除了可呼應「伴米」要表達的意涵，還帶入了一種期待：眼前的年輕人能在當代農村實踐過去農家之間會互相幫忙的精神。

當時內埔農業後援會的成員認為，相放伴一詞生動抓住他們參與後援會至今所經歷的珍貴過程，便接受放伴米的提議（吳宗澤、蔡嘉信 2017）。一直到穀笠合作社開始契作後，也沿用放伴米作為產品名稱，以彰顯產品是得自於青年、農民、消費者三方的合作。

以放伴來命名契作米，產生了一連串的效應：首先，這個詞提醒了成員，他們要做的事（比如協助老農轉作友善、年輕人務農等），是在放伴；此外，放伴不時在一些場合被講出來，不只這樣，他們還為了什麼是放伴而多次討論；就在不斷釐清、反思什麼是放伴的意義和具體行動的過程中，穀笠合作社成員與放伴之間的連結便不斷加深（田野紀錄 2016/8/31）。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逐漸看到農村中其實有團結、合作的可能性，能否將這樣的團結合作運用在自己身上，成為安居農村的支持力量，就成為穀笠合作社這個自立平台要去回應的問題。

為了延續生活方式實驗而成立的穀笠合作社，以契作方案為生計實驗的起手式，因應生計實驗而來的放伴概念則成為生計實驗的指導性原則。在這個指導性原則下的生計實驗，即使目標由表達性的好生活轉到工具性的討生活，仍具有預示實踐的意涵。

## 七、生計實驗與放伴社群的形成

想要走一條非主流之路的生活方式實驗者，如何面對主流經濟這個關卡？他們採取什麼行動？行動的效應為何？自 2014 年以來，放伴至今仍是指引生計實驗的重要原則。這個原則一開始被設想在青年自立的過程中發揮功能，但在試誤的實驗過程中，這個原則沒有引導行動團體走向創新創業的模式，而是引導他們以此原則為核心理念形成放伴社群。這個社群有三個核心要素：不以工資結清的交換關係、移居社群的戲劇空間、容納更多青年的居住空間。

### （一）生計實驗：從契作到多重收入管道

契作方案在農民老李願意嘗試轉型友善耕作的情況下展開。自 2014 年第一期起，到 2018 年第二期止，維持了五年。2016 年第一期的總契作面積將近兩甲。<sup>29</sup> 對於想要增加友善耕作面積的穀笠合作社而言，契作面積增加絕對是好事。不過，衍生的問題是面積越大、產出的米越多，但他們卻賣不掉這麼多。除了米賣不完，因契作產生的內部分歧也逐漸產生。

一方面是契作方案實施後，開始有成員意識到參與內埔農業後援會和穀笠合作社是不一樣的。另一方面，有成員在契作面積最大的 2016 年開始焦慮，覺得看不到未來。例如，有成員指出他在團隊中針對問題做了分析與決策，但其他人並沒有照著做，只挑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特別是關於商業經營的事都沒有被執行。他認為當初成立穀笠合作社是要解決生計問題，但賺錢的事都歸他，其他人去做「有意義」的事情，不免產生自己在穀笠合作社的角色可有可無之慨（訪談紀錄 2021/8/18）。

到了 2017 年，他們採用的穀東制也面臨考驗。他們援引的穀東

---

29 資料來源：〈歷年放伴米統計數量〉（穀笠合作社提供）。

制是希望消費者能分擔農民在轉型為友善生產過程中歉收的風險。從慣行轉為友善耕作的老李，田區還有慣行留下的肥力，所以在初期的產量都比預期多，穀笠合作社也把多的部分回饋給穀東，每個穀東都收到比預定量 10 公斤更多的米。然而，2017 年一期作，因天候因素和肥力遞減的關係，老李田區的產量大減，由 2016 年第二期的 4,127 公斤減為 2,357 公斤（乾穀重），<sup>30</sup> 收成量不足以交付給穀東足量的米。基於穀東制的風險分擔原則，穀笠合作社向穀東說明情況，還以舊米和多贈一包米的方式補足量，多數穀東都能接受，甚至還有穀東說不用補（田野紀錄 2018/04/19）。事情落幕後，團隊內部討論到，穀東制的概念良好，但這一次因天災因素取得穀東的諒解，下次若遇到天災之外的因素而減產，還有什麼立場要求穀東分擔風險？就算都是天災因素而減產，但穀笠合作社成員能料到當次數多了，他們面對穀東只會越來越開不了口，於是他們逐漸不再堅持穀東制（田野紀錄 2018/3/24）。

除了穀東制，友善生產也持續暴露人力不足的問題，特別是除草的問題。起初穀笠合作社調配大量人力去幫忙，除了成員親自去，也招募其他人力去。到 2018 年下半年，穀笠合作社有感於持續大量調配除草人力的困難，也理解契作農民因難以獨自負擔繁重的除草工作而有意使用除草劑，便在確認契作農民意願後終止契作關係。從 2019 年第一期開始，堅持友善生產的穀笠合作社決定自己接手生產工作，由部分成員擔任農民，也因為要維持友善生產模式，便把生產面積縮小至可負擔的範圍。

2018 年，穀笠合作社執行水保局的水稻產業鏈增值計畫，期待以「六級產業化」的方式提高水稻產值，以支持三到四位年輕人留在農村，並讓他們在收入無虞的情況下，能長期經營農村的公共議題。這代表穀笠合作社要正面處理自成立以來一直沒有好好面對的「創業」問題。他們在此計畫嘗試的是稻米的產品加工開發與銷售（產品

---

30 同上註。

包括米果、玄米茶、米酒等)。

然而，投入水稻產業鏈增值計畫一年，具經濟規模、能養活所有成員的「商業模式」並沒有成形，但是他們沒有因此放棄「六級產業化」的概念，持續經由上述的管道取得部分收入，此外也開始接受兼業也是獲取收入的管道。於是從 2019 年起，穀笠合作社以「六級產業化」為主軸，透過稻米的產品加工開發與銷售、實質農業生產（稻米、玉米）、與在地業者合作等方式，創造自立平台運作的收入，同時成員也以兼差性工作（包括農業生產、計畫兼職助理、農場打工、市場攤商打工、帶團導覽、寫稿等）維持個人生計。除了這些有實質收入的管道，成員也和在地的農友與業者發展出不以工資結清的交換關係，透過此關係創造生存資源是支持穀笠合作社的農村生活方式實驗得以持續的重要經濟條件。

## （二）放伴社群的形成

### 1. 不以工資結清的交換關係

謝繼昌（1975）於 1970 年代在籃城記錄到三類農業勞動：家族工、換工、僱工。前兩者不涉及工資，差別在於家族工的成員來自同一家族，換工的成員來自跨家族，他們組成隊並在其中進行勞動力交換。在穀笠合作社成員展開生活方式實驗時，籃城已經沒有半個換工隊，但他們還是希望在當代農村中重現換工隊的互助精神。

自啟動契作方案以來，穀笠合作社看起來就像賣米的通路，不過他們都不希望成為他們批判的對象：靠剝削農民賺錢的商人或行口。在放伴的理念下，即使和農民契作，他們和農民的關係並非銀貨兩訖，「你種我收，你忙完了，我付你工資，關係就結束」；而是試圖捲入農民的生產過程、周邊的人脈網絡，並成為他們的朋友（田野紀錄 2016/8/31）。

不希望和農民的關係在付完工資後就結清的穀笠合作社最先是透過助人實踐放伴；到 2016 年，他們依稀把放伴視為「打群架」、「形成社群」，只是還無法把這個感覺描述得很清楚（訪談紀錄

2024/6/3)。直到他們從互動的夥伴身上，發現有些人不只接受幫助，甚至還會反過來幫他們，才逐漸形成「放伴不只是單向地助人，還應當是雙向的互相幫忙」的看法。

移居埔里的筍農守安、在地的香草農場台光，都是和穀笠合作社維持互相幫忙關係的生產者。種植水筍、香草的他們都需要大量人力，以家庭農場模式經營的他們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本聘請農工，而穀笠合作社能夠給予最直接的協助就是提供勞動人力，包括自己與招募來的人力。這也是穀笠合作社最初的放伴：幫助別人。同樣的，在穀笠合作社的契作農場需要人力時，曾受幫助的他們就出現了。此外，在穀笠合作社有活動或計畫人力的需求時，他們皆盡可能提供協助。甚至，他們後來還與穀笠合作社合作，以自家農產開發出包裝產品，而使得雙方都獲益。

移居埔里開業的阿妃是另一個例子。阿妃 2018 年到埔里開素食餐廳，因為找尋在地的小農產品而找上穀笠合作社，並在穀笠合作社的協助下找到農友與食材。他的餐廳開張後，以友善農友的食材（包括放伴米）做出佳餚，頗受市場歡迎。不過因為店租、長時間工作的模式讓他和夥伴不堪負荷，在 2021 年後改以預約制延續餐廳的經營。在穀笠合作社的協助下，阿妃在籃城找到可負擔，且兼具居住和工作的落腳處。對穀笠合作社而言，阿妃不只是接受幫助，也熱衷參與穀笠合作社的活動，並且以自己的網絡宣傳穀笠合作社和埔里在地的小農（訪談紀錄 2024/6/3）。

這些啟動後就沒有中斷的幫與被幫逐漸讓穀笠合作社的成員意識到，放伴不只是單向地去幫助別人，雙向地互相幫忙才是放伴能持續運作的機制。在此之前，他們是當地農民幫助的對象，特別是在內埔實驗「公田」模式期間；在穀笠合作社成立初期，成員開始主動幫助別人，成為別人「許願」的對象，偶爾也成為「免費的人力」。2019 年以後，他們除了主動幫助別人，也開始和受幫助對象發展出不以工資結清的交換關係。這種交換關係，是在互相拋球跟接球的「審核」過程中形成的。阿澤這麼描述這個過程：「善的循環，總是要有人先

開始，因此只要有事，我們就到場，要人力，我們就是人力下去就直接去幫。」此外，「雪中送炭總是比錦上添花重要，因此當別人開口時，想辦法去回應他。」他也運用「債」的概念說明：「我讓你欠債，至於他會怎麼還回來，不知道，但是他還回來的時候，下一輪的迴圈就會開始了」（田野紀錄 2023/4/7）。

在這個互相拋球跟接球的審核過程中，穀笠合作社成員會和某些人產生出合作的默契，建立對彼此的 credit（信賴），<sup>31</sup> 而產生善的循環、互助的迴圈。當然也有無法產生默契和 credit 的情況，那就不會有下一個循環、迴圈。在彼此「審核」、互動的過程中，他們由 *kimochi*、人情、感性的內容偵測彼此能否共同趨近友善或倫理道德，而不是趨向商業的邏輯（訪談紀錄 2024/6/3）。經過這種互相「審核」的過程，若是合作雙方有一定的默契、建立 credit，在各自有專業的情況下，就能形成專業者與專業者之間的協作，甚至創造共同的經濟利益（訪談紀錄 2024/6/3）。

## 2. 移居社群的戲劇空間：冬至圓

2014 年底，阿君開始設想「劇團」方案的可能性。他認為穀笠合作社既然是一個青年在農村的自立平台，且最初六個成員都想要在埔里農村安居，應是要依據個人的興趣發展其他方案，不一定每個人都去種田、賣米（訪談紀錄 2021/8/17, 2021/11/4）。正好，他發現成員中有人喜歡演戲、有人很會寫劇本、還有人想導戲。

2015 年 9 到 11 月，阿民請穀笠合作社協助文化部村落發展計畫。阿君藉著這個計畫提供的支持，嘗試戲劇培力。他聚集有興趣的人，每週聚會、排戲。在這個計畫結束後，他們仍每週聚會，並在 2016 年公開演出三齣劇，分別是 2 月於籃城書房曬書節、3 月於嘉義草草藝術節演出「三個人一封信」，11 月於埔里的客家庄剝牛坑演出「山村阿嫁婆」，12 月於籃城演出「冬至圓」。

---

31 將 credit 翻成「信賴」，是我在訪談後向報導人確認的中文意思。

阿君看到劇團的兩個可能性：其一，提供在農村的青年聚會的平台；其二，提供農村青年製作方案之外的收入管道（訪談紀錄 2021/11/4）。不過，在 2016 年的三齣劇和四場演出後，阿君希望其他夥伴也能投入，和他一起看著劇團再往前走。不過當時正值製作方案面積擴大的高峰，其他夥伴無暇分身。在沒有其他夥伴可投入更多的情況下，「草根劇團」在 2017 年暫先擱置，直到 2018 年底，為了縫合移居青年與社區的裂縫（田野紀錄 2023/4/7），劇團在新的文化行動框架——祭典——下重啟。

2017 年阿澤在金門當兵期間參與了土豆音樂季的籌辦，看到一個沒有資源的地方，如何透過「祭典」凝聚地方的社群；他體悟到祭典是一個可以接納各種多元的、異質的元素，又可以去擾動地方的架構（訪談紀錄 2021/12/17）。回過頭來看，阿澤雖然仍不認為劇團是創業的方案，但肯定它是社群聚會的方法，且它創造的空間可以讓人們在其中舒展肢體、釋放壓力、發揮天賦（訪談紀錄 2021/12/17）。

2018 年 11 月底的村里長選舉，籃城有三位候選人競爭。<sup>32</sup> 穀笠合作社在這次選舉中支持候選人 CR，CR 原是社區發展協會幹部，長期投身於社區工作，非常支持住進籃城的青年，然而因為 2016 到 2017 年間協會內部發生一些事，讓他受了不小的傷，在 2017 年上半年退出社區的公共事務領域。原本沒有打算參選里長的他，在計畫參選連任的候選人 H 因健康因素退選，他又獲得社區部分人士支持的情況下登記參選，但最終以第二高票敗選。阿澤同情 CR 在社區遭受的對待，便希望能透過行動來聲援。

這時候阿澤看到農村武裝青年發出要到各地巡演的訊息。他很快聯繫並敲定到籃城演出的時間與場地。他們敲定的時間是冬至，地點在 CR 家的稻埕，活動名稱沿用 2016 年 12 月冬至，草根劇團在同一

---

32 1970 年代初期謝繼昌（1973: 72）在籃城的蹲點研究，即觀察到在寧靜的鄉村生活背後存在派系鬥爭，尖銳地表現在選舉過程中。但籃城的社區生活不總是處於政治競爭關係中，事實上籃城在社區工作方面表現出異常的活力、成績也亮眼，獲獎無數，但因本文討論的主題不在此，也就無法對這些令人激賞的成就多做描述。

個場地演出過的戲劇冬至圓。

有了農村武裝青年提供的音樂演出活動以後，阿澤再把草根劇團帶進來，提供戲劇的內容。儘管草根劇團在 2016 年的四場演出之後停擺了近兩年，但還是很順利地完成動員。此外，曾在日治期間創立的社區武館習武、練拳的師傅們，也被邀請進來，為活動提供武術和舞獅表演。在有了音樂會、戲劇、社區武術和舞獅的內容之後，阿澤再把他平時往來的在地業者網絡納入，為活動加入「市集」的內容。最後，阿澤又邀請在新農運網絡中具知名度的人物，在主活動開始前到 CR 家稻埕、籃城好生活客廳等處開講，暢談他們在各地農村，農業和食物各方面的所見所聞，為冬至圓活動增加內容與深度。

以 CR 家稻埕為主舞台的冬至圓，以文化活動的形式展現一個移居團體在地方累積將近五年的實力，同時表達對 CR 的相挺之意。此後，穀笠合作社每年冬至都在籃城舉辦冬至圓活動。一年一次，這個由移居團體新創的傳統節慶活動，逐漸與當地生活的時間週期、傳統文化鑲嵌在一起。

以劇團作為社群聚會方法，在祭典的框架下重啟；有劇團作為主要內容的祭典，除了在準備過程中有動員社群的效果，還有助於移居社群與地方融合。對阿澤來說，辦冬至圓活動隱含動員社群、地方連結這兩個目的（田野紀錄 2018/12/20）。以動員社群來說，他在意的是辦這樣的活動能不能讓自己人動員，讓自己人齊力成就某件事，至於有多少人來、熱不熱鬧都是其次（田野紀錄 2019/12/21）。以地方連結來說，他希望移居社群藉由這個文化活動更融入在地。對他而言，冬至圓某種程度是把新的枝椏「嫁接」在舊的結構上（訪談紀錄 2021/5/1; 2021/12/7）。新的枝椏是移居社群的隱喻，舊的結構則是在地傳統社群的隱喻。阿澤對於新舊社群共同生活的意象是：在傳統農村上面還有一個新的在地生活圈，而他要在這兩群人之間找到交疊與共融之處（田野紀錄 2023/4/7）。

冬至圓這場結合劇團與祭典的文化活動，讓陪伴社群成員的互動不只是不以工資結清的交換關係，還有文化性的戲劇空間，得以凝聚

彼此、與地方社會共融。社群成員藉此戲劇空間得以修補自我，以及和他人的關係。

### 3. 容納更多青年的居住空間

穀笠合作社的農村生活方式實驗不只希望自己能在農村安居，也希望更多年輕人能住進來或留下來，因此他們意識到應該創造更多像籃城好生活一樣的居住空間。

2017 年下半，以籃城好生活作為生活和工作主要根據地的穀笠合作社，嘗試在埔里拓展社群的生活空間，具體來說包括：可讓移居者入住與接待打工換宿的「角間工作站」、「小村映巷」，以及兼容消費性活動和公共性活動的「禾恬 Cafe & Bar」。這些空間都有居住功能（無論是短期或長期），能夠創造異質網絡的連結，並讓身處其中的人們得以在自然的氛圍中產生有情感、知識、理念等方面的交流。這些農村中自有和出租的建築物件，都是在穀笠合作社的農村生活方式實踐中，以招募更多人入住農村為目的所擴展的居住空間。

除了禾恬 Cafe & Bar 是穀笠合作社成員以購買的方式取得所有權，再重新打造成營業、自住兼穀笠合作社可使用的空間外，其餘的空間都是穀笠合作社透過租的方式取得使用權，再轉租給需要入住的移居者，或者接受入住者以各種形式的勞動力（如演講、農場勞動、實習等）換取入住權。或許有人會質疑這種「二房東」的做法，但以穀笠合作社的立意來看，轉租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希望藉此慢慢重建地方的生活圈，讓傳統農村可以有越來越大的空間，接納非本地人入住。阿澤表示：「有點像在翻棋，把象棋一個一個翻轉成年輕人可以在農村裡面過生活的地方」（田野紀錄 2023/4/7）。

對於做此空間版圖的擴展，阿澤有深刻的體認，當代農村的問題夠多元，也夠複雜，但也因為這樣，農村更需要能夠吸引更多人進來，讓不同的人共同在這邊生活，為在地的問題慢慢地創造出在地的解法（田野紀錄 2023/4/7）。

早先在大學城想像的大學公民培育計畫下，幾位青年住進籃城的

閒置空間，試圖以生活方式實驗活化在地農村；如今，持續在埔里預示農村好生活的他們，嘗試讓更多青年住進去，共同填補埔里農村中的空隙、活化埔里的農村。以這個過程來看，容納農村生活方式實驗的自由空間，逐漸以籃城好生活為中心向周圍農村的空隙開展出去。

## 八、結論

我認為除了生活方式政治的視角，還需要藉由預示政治的概念才能清楚說明青年移居農村的 lifestyle 選擇為什麼是政治的。經由預示政治概念，我們可理解到青年移居農村的 lifestyle 選擇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為此政治實踐以 lifestyle 實驗為手段，體現未來的目的。手段與目的、現在與未來、現實與理想，原本都是不相同、存在差距甚至互斥的範疇，但 lifestyle 實驗將之疊合在一起，難分彼此了。以本文討論的青年移居團體來說，他們的 lifestyle 選擇具政治意涵，是因為他們藉由 lifestyle 實驗，預示農村好生活的可能性。

就一般的理解而言，藉由 lifestyle 政治視角與預示政治概念來看青年返鄉，能講述的就不會只有關於築夢、務農或創業的故事，也能講述關於居住的故事，並看到那些看似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居住其實具有政治意涵，是政治行動。如本文的個案分析所示，具有政治意涵的青年居住行動是在特定時空脈絡、在地條件下形成的。不過在此不擬重複這些細節，只在經驗分析的基礎上指出本個案傳達的理論意涵。

首先，有別於把移居農村視為逃離的看法，本文的個案是住進農村，而不是逃離都市。我無意說以逃離描述或有逃離特徵的個案都不具 lifestyle 政治意涵，事實上，像是 Andrej Grubačić 與 Denis O'Hearn (2016) 討論的流放社群 (exilic community) 都是逃離的個案，但都具有基進的政治意涵。本文個案和這些具逃離特徵個案不同的是，他們不像是 lifestyle 移居、逆都市化所描述的從 A 地逃到 B 地，也不是自願或被迫從國家或市場經濟體制退出 (exit)，尋求自主性的流放社群。若以 Albert O. Hirschman (1972) 的概念來說，

如果這些流放社群的自主性來自於退出，或者所謂具自主性的退出（exit-with-autonomy）（Grubačić and O’Hearn 2016），本文的個案不是經由退出而尋求自主性，而是沒有退出的自主性個案（a case of autonomy-without-exit）。<sup>33</sup> 這種沒有退出的自主性必須有實踐上的物質環境條件：農村中的空隙。在概念上，本文以自由空間來描述這些空隙。

於是，另一個值得回應的問題是，自由空間作為生成預示政治的有利環境具有什麼特徵？Evans 與 Boyte 強調此環境得以引發密集、深入的公民學習，Polletta 等社會運動研究則看重環境中「遠離主導團體的直接控制」。本文的自由空間——籃城○○號的居住空間——最早來自於大學與地方連結的大學城想像下的公民培育計畫，其環境特徵比較接近 Evans 與 Boyte 的界定。即使如此，我不否認這樣的自由空間如 Polletta 所看到的，具有產生反抗意識或認同的可能，但不必然是「遠離主導團體的直接控制」。<sup>34</sup> 如果要精確指出此自由空間的區位，我傾向說是處在有問題的結構——農村——的空隙中。在過往，農村為了工業、都市發展的需要，被吸走許多人口和資源，留下不少也不小的空隙；在這些空隙需要重新被填回去的設想下，本文討論的青年在受了啟發和鼓勵下自願住進這些空隙。他們先住進籃城的空隙，後來更積極協助、招募更多青年住進埔里農村中仍舊未被填補的空隙，並且逐步建立放伴社群，讓埔里農村的未來更好。

這個與主流經濟遭遇的生活方式實驗有走出替代資本主義的路嗎？「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不只是青年團體期待走出的一條路，<sup>35</sup> 也是學術社群關心的問題。本文最後從放伴和預示政治角度指出這個移居農村的生活方式政治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具有哪些特殊之處。

自農村生存實驗啟動以來，放伴一直是穀笠合作社的重要行動

---

33 感謝審查人提醒「逃離」與具理想性的實驗在概念上是否可二分的問題，讓我有機會再思考與澄清。

34 感謝編委會提醒初稿在自由空間概念上的矛盾之處，讓我有機會修正。

35 引自 2013 年青年署「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成果報告，頁 2。

原則。以目前的結果來看，放伴實驗沒有開創出有規模的創新創業模式，但是形成以放伴為核心理念的社群。就傳統的意義而言，放伴是不涉及工資的勞動力交換，但穀笠合作社的放伴實驗不只形成經濟性的交換原則，更形成非經濟性的社群凝聚場合（戲劇空間）和逐漸開展的居住空間，要說他們在重新定義放伴的現代實踐意涵應不為過。就學術意義而言，穀笠合作社實踐的放伴不同於「互惠」（reciprocity），也不只是「互惠」。他們先是從「利他」導向的幫助別人開始，再逐漸形成由「信賴」所維繫的交換關係。<sup>36</sup>如 Polanyi（2001）界定的互惠，和再分配、家計一樣都屬於實質（而非形式）意義的經濟行為原則，但互惠原則的實踐有賴於對稱的社會組織，如家庭中的成員之間，或是庫拉貿易中每個人在另一個島上都有對應的夥伴，可建立個體之間對等的互惠。相較而言，穀笠合作社實踐的放伴可能更接近 Peter Kropotkin 界定的互助（mutual aid）：不只是互惠或互相幫助，也像一個社群一起做事（Grubačić and O’Hearn 2016:34）。而交換，對 Polanyi（2001）而言，即使是不涉及貨幣（如以物易物），仍算是一種由市場決定的經濟行為原則。這麼一來，我們就不能說放伴是把市場排除在外的替代方案，將之視為在社群內部透過市場交換來凝聚社群成員，讓社群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或許更適當。<sup>37</sup>穀笠合作社在 2019 年自製的社會影響力報告寫了一段話：「透過『市場』的力量，來形成在地社群經濟，並逐步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反映他們理解的市場有內外部之分，且想要透過強化內部市場來取得經濟的自主性（訪談紀錄 2024/6/3）。

預示政治的角度能夠凸顯穀笠合作社的生活方式政治和社會企業、「真實烏托邦」在替代方案實踐邏輯和途徑的差異。姑且不論實際是否達到所宣稱的效果，宣稱「以企業（或商業模式）為手段解

36 維持「信賴」的不是實質的「禮物」，而是無形的人情、感性的內容，和趨近於友善、倫理道德的行為準則。

37 感謝編委會建議作者應就文章中的主要關懷，同時可能也是研究對象的核心關懷，例如「放伴」，做深入討論。

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已被認為是可兼顧現實（生計）的理想實踐途徑，我在穀笠合作社看到不同於社會企業的理想實踐途徑：「以生活方式為手段預示理想的未來」。透過這一種預示實踐，行動者要邁向理想的目標，不需非得賺足「第一桶金」才跨出第一步，也不會因「沒有錢而萬萬不能」。社會企業邏輯可能忖度：要讓農村變好，我先賺錢，為往後好的目的做準備；預示實踐邏輯則是如此思考：我先成為可以幫助農村變好的移居人口，我就住在農村中，創造好的生活。穀笠合作社是後者的思考。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看到預示實踐途徑和「真實烏托邦」實踐途徑的差異。「真實烏托邦」的方法論——解放社會科學——是關於通往可能未來的理論，它的三大任務是：對現狀做系統性的診斷與批判；發展邏輯連貫又可信的理論，提出替代現行制度或社會結構的方案；了解如何達成可行的替代方案（Wright 2010）。對於如何實踐替代方案的問題，Wright 是在理論上提出轉型的策略，提供了「真實烏托邦」取徑的思考。和「真實烏托邦」途徑不同的是，預示實踐途徑不是社會變遷的理論，而是直接去實踐。Maeckelbergh（2011）就說，實踐者不需要等到分析完現狀、訂定預期目標和逐年計畫才去實踐，而是讓替代方案在實踐過程中被發展出來。從預示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替代方案的形成就是透過實踐，讓替代方案從想像（*imagination*）化為實在（*reality*）。相較於「真實烏托邦」途徑，預示實踐途徑讓我們離替代方案不會太遠，並且讓我們從此刻此地，就可以展開實驗。

誌謝：本文改寫自作者的博士論文第五章，文章初稿曾發表於 2022 台灣社會學年會、2023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第八屆博士後學者論壇。作者感謝穀笠合作社成員對於本研究的協助，他們提供研究所需的資料以及觀點方面的刺激，是本文能成形的最重要推手。同時感謝於上述研討會擔任評論人的余炘倫、王甫昌兩位老師分別對不同版本的初稿提出深入的見解；在投稿與修改期間，謝國雄、楊弘任兩位老師給了不少關於寫作和修改策略的建議，協助我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王安琪、林凱衡、黃俊豪、溫賈舒等同儕分享投稿經驗，並給了實用的建議。作為品質把關者的期刊幕後團隊，兩位匿名審查人、主編、編輯委員、編輯等，就每一個把關位置給了專業的審查和修改建議，讓本文有一再被精進、減少

出錯的機會。即使如此，本文不免還是會有錯誤和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這是作者應負之責。

## 參考文獻

- 吳宗澤，2019，《學「做」農：以埔里穀笠合作社為例試論新農的身份認同與社群性》。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 吳宗澤、蔡嘉信，2017，〈青年在農村的「公共性」實踐：穀笠合作社的個案〉。論文發表於在地思維：2017年「地方知識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中央大學客家學院。10月14日。
- 李丁讚，2010，〈重回土地：災難社會的重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8: 273-326。
- ，2016，〈導言：農業人文的誕生〉。《文化研究》22: 10-22。
-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台灣勞工陣線協會。
- 林從一，2014，〈台灣通識教育發展歷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7(2): 191-253。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15，〈從描繪夢想開始，打造水沙連大學城〉。頁169-209，收入陳恒安編，《大學3.0（上）》。台北：教育部。
- 陳瑞樺，2016，〈以農之名：台灣戰後農運的歷史考察〉。《文化研究》22: 75-122。
- 黃應貴，2021，〈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頁1-46，收入黃應貴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新北：群學。
- 楊智富，1990，〈可愛埔里人——他們都有一個夢：文化大夢〉。《藝術貴族》8: 74-79。
- 楊智富、孫立銓、黃茜芳，1990，〈文化造鎮：埔里藝術行〉。《藝術貴族》7: 20-31。
- 蔡晏霖，2015，〈重返土地，是最基進的革命〉。頁304-16，收入郭佩宜編，《芭樂人類學》。台北：左岸文化。
- ，2016，〈農藝復興：台灣農業新浪潮〉。《文化研究》22: 23-74。
- 鄭瑜雯，1988，〈藝術家的聚落：埔里〉。《風尚》17: 68-73。
- 謝繼昌，1973，〈水利和社會文化之適應：籃城村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 57-77。
- ，1975，〈埔里盆地稻蔗雙作農村勞力之鳩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 所集刊》40: 143-66。
- Asara, Viviana and Giorgos Kallis. 2023. "The Prefigurative Politic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ir Processual Production of Space: The Case of the Indignados Move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41(1): 56-76.
- Benson, Michaela and Karen O'Reilly. 2009. "Migr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Lifestyle Migratio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7(4): 608-625.
- Benson, Michaela and Nick Osbaldiston. 2016. "Toward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Lifestyle Migration: Reconceptualizing Migr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4(3): 407-423.
- Boggs, Carl. 1977. "Marxism, Prefigurative Communism, and the Problem of Workers' Control." *Radical America* 11(6): 98-122.
- Boyte, Harry C. 2005. *Everyday Politics: Reconnecting Citizens and Public Lif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Comaroff, Jean. 1985.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can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easap, Kimberly. 2021. "'Building Future Politics': Projectivity and Prefigurative Politics in a Swedish Social Center."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0(5): 567-583.
- de Moor, Joost. 2017. "Lifestyle Politics and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cta Politica* 52(2): 179-197.
- Dussault, Joëlle. 2022. "The Prefigurative Politics of Place-Making: Analysis of a Neighbourhood-Based Campaign for a Social Centre."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44.
- Evans, Sara M. and Harry C. Boyte. 1992. *Free Spaces: The Sources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atherstone, Mike. 1987. "Lifestyle and Consumer Cultu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4(1): 55-70.
- Forno, Francesca. 2023. "Lifestyle Politics." Pp. 267-270 in *Elgar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Maria Grasso and Marco Giugni.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rubačić, Andrej and Denis O'Hearn. 2016. *Living at the Edges of Capitalism: Adventures in Exile and Mutual Aid*.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enfler, Ross, Brett Johnson, and Ellis Jones. 2012. "Lifestyle Movements: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Lifestyle and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1(1): 1-20.
- Halfacree, Keith. 2008. "To Revitalise Counterurbanisation Research? Recognising an International and Fuller Picture."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4(6): 479-495.
- . 2014. "Jumping up from the Armchair: Beyond the Idyll in Counterurbanisation." Pp. 92-115 in *Understanding Lifestyle Migrati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Migration and the Quest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edited by Michaela Benson and Nick Osbaldist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Halfacree, Keith H. and María Jesús Rivera. 2011. "Moving to the Countryside ... and Staying: Lives beyond Representations." *Sociologia Ruralis* 52(1): 92-114.
- Hirschman, Albert O. 1972.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eckelbergh, Marianne. 2011. "Doing Is Believing: Prefiguration as Strategic Practice in the Alterglobalizatio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0(1): 1-20.
- Micheletti, Michele and Dietlind Stolle. 2012. "Vegetarianism—a Lifestyle Politics?" Pp. 127-47 in *Creative Participation: Responsibility-Taking in the Political World*, edited by Michele Micheletti and Andrew S. McFarland.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 Monticelli, Lara. 2021. "On the Necessity of Prefigurative Politics." *Thesis Eleven* 167(1): 99-118.
- O'Reilly, Karen and Michaela Benson. 2009. "Lifestyle Migration: Escaping to the Good Life?" Pp. 1-13 in *Lifestyle Migration: Expectations, Aspirations and Experiences*, edited by M. Benson and K. O'Reilly. New York: Routledge.
- Polanyi, Karl.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Polletta, Francesca. 1999. "'Free Spaces'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8(1): 1-38.
- Reinecke, Juliane. 2018. "Social Movements and Prefigurative Organizing: Confronting Entrenched Inequalities in Occupy London." *Organization Studies* 39(9): 1299-1321.
-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 Sande, Mathijs. 2013. "The Prefigurative Politics of Tahrir Square: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2011 Revolutions." *Res Publica* 19(3): 223-239.

- Wang, Chi-Mao. 2023. "Escape to the Countryside: Affects and Rural Eventful Atmospheres." *Habitat International* 140(2): 102929.
- Wright, Erik Olin. 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 Yates, Luke. 2015a. "Rethinking Prefiguration: Alternatives, Micropolitics and Goals in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4(1): 1-21.
- . 2015b. "Everyday Politics, Social Practices and Movement Networks: Daily Life in Barcelona's Social Centr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6(2): 236-258.
- . 2021. "Prefigurative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 Strategy: The Roles of Prefiguration in the Reproduction, Mobilis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Movements." *Political Studies* 69(4): 1033-1052.